

古代散文的典範

唐宋八大家

葛曉音 選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葛曉音先生《唐宋八大家：  
古代散文的典範》讀後

劉 寧

中國古代散文這條長江大河，在唐宋時期曾掀起壯闊的波瀾，形成繼先秦之後的又一次高潮。八大家的散文，則是這一高潮中最壯麗的景象。

八家之文，又被稱為「古文」。韓愈作為古文宗師，提倡為文以三代兩漢為法，在形式上以奇句單行為主，迴避駢儷色彩；在內容上則強調「發明古道」。「古文」並非單純復古，而是以復古為創新。韓愈以巨大的藝術創造力，通過古文寫作表現了復興儒道的現實思考，其藝術成就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宋代散文作者以韓愈為法，繼承古文創作道路而益之以豐富的精神藝術創變。清人劉開云：「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與阮芸台官保論文書》，自《劉孟塗集》）這個評價洵非過譽。

從兩宋之際，人們就開始自覺對古文藝術進行總結和研究，越來越將研究對象集中在「唐宋八大家」這八位作者身上。從今天傳世的文獻來看，「唐宋八大家」這一並稱，始於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但對八大家的特別重視，是長期古文研究中所形成的。清人方東樹說：「唐、宋以來，號能文者，無慮數十百家，日久論定，其卓然不可易者，八家而已。」他認為八大家罕有倫比的典範地位，是千百年歷史沙汰的結果。當然，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清代才子詩人袁枚有詩云：「詩亡原只存三百，文古何曾止八家」（《小倉山房文集·補遺》），認為論文只談八家，並不足取。清代文章家儲欣亦提出「大家豈有定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序》），他編選《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就是要打破八家之限；其後還有《唐十二家文選》（蔣湘南）、《唐十八家文錄》（張文虎）等選本，對唐文的選取，更為寬廣。劉開則指出八家成就參差不齊，不當相提並論：「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即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慚。」（《與阮芸台宮保論文書》）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異議，但還是有更多的意見肯定八大家遠過於其他唐宋散文作者的典範地位。清代著名選家張伯行，就從八大家

何以為「大家」的角度，對此有詳細的分析：「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為難，其得稱為大家，抑尤難也。是故巧言麗辭以為工者，非大家也；鈎章棘句以為奧者，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駢四儷六以為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為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偉俊，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此韓、柳、歐、蘇、王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哉？」（《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序》）

《孟子》云：「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於江海者，要從壯闊的波瀾去領略江海的偉大。求道如此，為文亦如是。要體會古典散文的藝術成就，唐宋八大家是必須領略的奇觀，葛曉音先生這本《唐宋八大家》則是學習八家之文絕好的津梁。

葛曉音先生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尤其是中古以及唐宋詩文方面，取得了精深而卓越的成就。她的《八代詩史》《漢唐文學的嬗變》《山水田園詩派研究》《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唐詩宋詞十五講》《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等專著，都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對於唐宋古文，葛先生有一系列重

要的論文，如收入《漢唐文學的嬗變》一書中的《論唐代的古文革新與儒道演變關係》《古文成於韓柳的標誌》《中晚唐古文趨向新議》《歐陽修排抑太學體新探》《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歷程》等。葛先生對唐宋詩文演變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全面的把握，她特別從儒道內涵的演變出發，對唐宋古文運動的精神追求，做出深入觀察，指出中唐古文運動的成功，主要在於韓、柳對儒家傳統的政治觀和文學觀進行了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許多反傳統觀念的新解，得到當時新興庶族士人的響應，才能以「道」的變革帶動古文自身的革新。對於北宋詩文革新，前人多將宋初富於駢儷風格的西崑體創作，視為歐陽修等人革新文風的對立面，葛先生則通過細緻的梳理，指出北宋詩文革新經歷了反對五代體、西崑體和太學體三個階段，其革新的成功在於徹底糾正了尊雅頌、貶風騷的觀念，確立了以風騷為本的風雅觀，樹立了影響有宋一代的平易典要的文風。這些思考都揭示了唐宋古文運動的深層原因。對於唐宋古文的藝術成就，葛先生曾在《古文成於韓柳的標誌》一文中圍繞韓柳的文體革新之功，做出過深入的分析。她指出，韓柳在應用文章中灌注了自己的個性、遭遇、感慨、意志和心緒，從而使散文跨

入了自由的藝術領域；而中晚唐古文創作的衰落，則進一步反襯韓柳高超的藝術創新成就。這些認識都對唐宋古文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作為一位深入唐宋散文之江海、探驪得珠的研究者，葛曉音先生編選這本八大家讀本，無論是對八家成就的條析論列，還是對具體篇目的編選解說，都深具會心。書前的導言，提綱挈領，觀其大體，讀者可以由此對唐宋古文運動通觀衢路。書中所編選的八家之文，全面地呈現了古文作者的文道追求，對文章藝術的品鑒亦頗堪玩味，如其論柳宗元「永州八記」之《袁家渴記》：「寫一路所見到的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佳木異卉、美石岩洞，令人目不暇接，似乎漫無中心，最後卻拈出一個『風』字，用華美鋪陳的辭藻，將水聲、花氣、樹響一總收束到山間水上沖盪迴旋的大風中，染出奇光異彩，使繽紛繁雜的畫面歸結於『幽麗奇處』的主要特徵。」評說蘇軾《赤壁賦》「曠達的情懷，明徹的哲理，融和在山水與簫聲之中，交織成一個詩意盎然，韻味深遠的優美境界。《後赤壁賦》寫冬夜遊於赤壁之下，山高月小，斷岸千尺，江流有聲，孤鶴夜渡的景色，字字如畫。境界的蕭條森爽，又與《赤壁賦》的清曠邈遠迥

異其趣。」如此精妙的解說，既揭示了文理，又神韻悠然，回味無窮。

相信這本對唐宋散文藝術觀瀾索源的讀本，會對所有期望領略八大家波濤之盛的讀者，有切實的幫助。

## 目 錄

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範.....	1
韓愈.....	67
原毀.....	67
師說.....	73
進學解.....	79
張中丞傳後敘.....	90
雜說 其四.....	102
送李願歸盤谷序.....	104
藍田縣丞廳壁記.....	110
祭十二郎文.....	116
柳宗元.....	127
段太尉逸事狀.....	127



捕蛇者說.....	141
三戒.....	147
鈞潭西小丘記.....	155
小石潭記.....	159
歐陽修.....	163
朋黨論.....	163
五代史伶官傳序.....	170
醉翁亭記.....	176
秋聲賦.....	180
瀧岡阡表.....	186
蘇洵.....	198
六國論.....	198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節錄）.....	204
曾鞏.....	211
墨池記.....	211

王安石	216
答司馬諫議書	216
讀孟嘗君傳	221
遊褒禪山記	223
蘇軾	229
留侯論	229
潮州韓文公廟碑	237
答謝民師書	250
石鐘山記	256
赤壁賦	263
後赤壁賦	270
記承天寺夜遊	275
蘇轍	277
上樞密韓太尉書	277
黃州快哉亭記	283

# 唐宋八大家

## ——古代散文的典範

「唐宋八大家」是我國唐宋時期八個著名的散文大作家的合稱。他們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和蘇轍。八大家文代表着我國古代散文史上的第二個高峰——唐宋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中國古代散文的第一個高峰是先秦兩漢時期。《尚書》向來被視為我國散文的一個重要源頭。這部記載虞、夏、商、周歷史的典籍，有典、謨、訓、誥、誓、命六種文體，載言記事質樸典要，但文字古奧難懂。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動盪、政治的急速變化和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促進了散文的全面繁榮。出現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敘事詳博的歷史散文，以及《老子》《論語》《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豐富多彩的諸子散文。它們語言平易、邏輯嚴密、文氣流

暢、說理透闢，形成了既適宜於實用又富有文學價值的新文體。兩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記載史事以描摹人物為中心，成為我國紀傳體史書的開山祖，標誌着記敘散文的高度發展。與此同時，兩漢的政論文由先秦的雄辯誇張變為淳厚切實，其中有不少名篇成為後人效仿的範文。

從東漢時起，文章中出現了句式整齊、文辭對偶的傾向。魏晉南北朝時期，駢體文逐漸形成。「駢」是並列、對偶的意思。這種文體全篇以雙句（又稱儷句、偶句）為主，最多見的是用四字、六字排比或間隔交錯，叫作駢四儷六。並且講究聲律、對仗、辭采華美和使用典故。由於南北朝時文學觀念發生變化，對文學形式和藝術技巧的探索更加深入，駢文便逐漸取代了散文。先秦兩漢時期，文學、哲學和史學沒有分家，還沒有出現純文學的散文。南朝文人提出要把應用文章和文學作品區分開來，一部分駢文尤其是序文、書啟中便產生了一些抒情寫景的文學作品。後來絕大多數應用文也都趨向駢儷化。散文只能在少數歷史地理著作中保留一點自己的地盤。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盛唐初。

唐代的駢文更加盛行，又大多用來歌功頌德、粉

飾太平，變得愈來愈空洞浮誇。這時有一部分文人認為這種浮華的文風對於政治十分有害，便主張對文體來一次革命。初盛唐已有少數政治家改用散文給皇帝上奏疏，其中陳子昂所寫的政論文樸實平易，成為散文復興的先導。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由極盛急轉為極衰。不少文人認為國家動亂的根本原因是儒家古道的衰落，而儒學衰微又是因為浮靡文風流行，所以紛紛起來反對「儷偶章句」，提倡三代兩漢的文風。李華、元結、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寫下了大量議論散文，闡述他們改革文風、復興儒學的主張。但他們推崇的古文，主要是以上古的典誥之文作為最高標準。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文體既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也無法在文學性和藝術表現上與駢文爭奪優勢，這就使他們本人的散文成就受到局限。加上當時從事散文創作的人大多缺乏創新的能力和過人的才華，所以儘管散文數量已大大增多，卻還沒有形成一種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足以勝過駢文的新體散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韓愈和柳宗元意識到要復興古道，首先必須對古文自身進行革新，並自覺地擔當起創造新體散文的歷史使命。這種精神又為歐陽修等宋代散

文大家所繼承。歐陽修所領導的北宋古文運動以學習韓柳散文為號召，同時又批判了唐末宋初古文中的不良傾向，將宋代散文引上了正確的軌道。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精神上一脈相承，又各具鮮明的藝術風格。它們繼承了先秦兩漢散文的優良傳統，帶動了唐宋散文的全面繁榮，又對後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歷來被奉為古代散文的典範。

### 唐世文章 首稱韓柳

前人常說，唐代文章家有「韓柳」，就像詩人中有「李杜」。韓愈和柳宗元齊名並稱，主要是因為兩人都是中唐文壇的領袖。他們相互呼應，一起倡導古文運動，並在創作上達到了唐代散文的頂峰。

所謂「古文運動」，是現代人的概念。唐代古文運動指的是發生在公元8世紀後期的一次文體革命。它的口號是「文以載道」，就是要求用散文來闡明儒家古道的宗旨，擺脫駢儷體裁的束縛，使文章的形式為內容服務。因為參加的人很多，目標明確，既有理論指導，又有創作實踐，形成了規模較大的文學浪潮，所以稱它為

文學史上的一次運動。

韓愈和柳宗元為甚麼要發起這場運動呢？原來，唐王朝經過安史之亂後，一直沒有恢復元氣。河北藩鎮割據，不服中央管束；朝廷裡宦官專權，地方上貪吏橫行；賦稅繁重，民不聊生；加上外族頻頻入侵，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政治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這時一大批關心國家命運的文人就起來指摘朝廷的得失，尋求改革現實的處方。雖然他們的政治派系不同，但都主張恢復孔孟之道的正統地位，強化封建秩序，維護中央集權，減輕剝削，緩和社會矛盾。

韓愈和柳宗元當時不屬於同一個政治集團，但對很多社會問題的看法基本一致。他們都認為從漢代以後，儒學在佛教和道家思想衝擊下，不但越來越衰落，而且被摻進了許多雜七雜八的東西，已不符合孔孟的本意，所以首先要對儒家思想來一番清理。他們提出，孔孟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以修身正心和任人唯賢作為治國平天下的根本。朝廷應當選用真正有才有德的人士參與政治，才能使古道得以復興。由於他們根據現實形勢的需要對孔孟思想做出了新的解釋，傳統的古文形式已不能為新的內容服務，所以他們對「載道」的古文，也主

張在文辭上「能自樹立，不因循」<sup>①</sup>。也就是說，「學古道則欲通其辭」<sup>②</sup>，不弄通古文辭當然沒法學古道，但通文辭不是模仿因襲，而是「師其意不師其辭」，要學古人措辭的意思，並不是照抄他們的文句。而要做到樹立自己的一家之言，又必須加強自己的學識和道德修養，「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sup>③</sup>，修養好，氣勢足，則文句的長短和聲調的高低自然都會合適。由於重視古文的創新和作者的修養，韓柳才能在學習先秦兩漢散文的基礎上，廣泛吸取前代各種文學形式的藝術經驗，根據當代口語提煉新的散文語言，創造出以奇句單行為主，有條理、有規律，適宜於說理、抒情、敘事的新散文。在他們的指點和影響下，又湧現出一大批古文作家，這種新散文便成為中唐以來最流行最合用的文體。

韓愈生於公元 768 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州市）人，原籍昌黎（今河北省東北部一帶）。出身貧寒，三歲就成了孤兒，由大嫂鄭氏撫養成人。二十五歲中進

---

① 韓愈《答劉正夫書》。

② 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

③ 韓愈《答李翊書》。



士，二十九歲踏上仕途，在科舉中曾歷經坎坷。早年擔任過汴州觀察推官、四門博士、監察御史等官職。他天性剛正，敢說直話，毫無顧忌。貞元十九年（803），因關中一帶遭受旱災，發生饑荒，他給唐德宗上書請求寬免百姓的賦稅徭役。皇帝大怒，把他貶到廣東陽山去做縣令。他在陽山很得民心，不少人用他的姓給兒子起名字。後來召還朝廷，又曾幾次被黜，後升任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他跟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鎮吳元濟的叛亂，升刑部侍郎。過了兩年，唐憲宗派使者將佛骨迎到宮中，韓愈上書勸諫，觸怒皇帝，幾乎被殺。幸虧裴度救援，才被貶為潮州刺史，後來移任袁州刺史。在此期間，他經常訪問民間疾苦，放免農民抵押給豪門地主做奴婢的子女計七百多人。唐穆宗時，他奉詔回京，任兵部侍郎。又奉命出使鎮州，勸說藩鎮王廷湊歸順朝廷。在王廷湊部下全副武裝、嚴陣以待的情勢下，他毫不畏懼，長驅直入，與將士們辯論。歸來後任吏部侍郎。公元824年病故，終年五十七歲。諡號為「文」，所以後世又稱他為「韓文公」。

韓愈的散文有三百多篇，內容豐富複雜。最著名的《原道》《原性》《原人》等文章，集中闡明了他對古聖

賢之道的看法。所謂「聖人之道」，就是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等聖賢一脈相傳的道。韓愈確立了這一「道統」以後，又指出漢魏以後佛教和老莊思想流行，對聖人之道極為有害。最大的害處是佛老不要仁義，不要君臣父子。而儒家講道德仁義，要以救世的公心為出發點，分清君、臣、民的各自職責，設禮、樂、刑、政維持封建秩序，這種秩序應當建立在「以智役愚」的社會等級之上。這些理論後來雖然被封建階級當作維護自己統治的主要依據，但在當時，他主要是針對現實而發的。一方面，藩鎮擁兵割據，父子世襲，無視君的絕對權威，不守為臣的本分，使韓愈深惡痛絕。另一方面，朝廷用人只看門第出身，上層貴族子弟享有種種特權，下層官僚或平民子弟遭到排擠，韓愈認為這是朝廷用賢的最大障礙。所以《原道》着重論證了根據賢愚劃分社會等級的必要性。《原性》說人性分上中下三品，區分等級的標準是仁義禮智信。人的差別僅在於本性的賢愚、善惡，而不在地位的高低貴賤。《原人》說聖人主張對人不分遠近，一視同仁，仁就是「博愛」。當然這只是要求實現地主階級內部的平等博愛，對於人民的仁政，則是以民必須向

君「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為前提的。要是不交，還得殺頭。不過話又說回來，韓愈在給皇帝的一些奏疏中，還是反映了當時百姓在旱災饑荒和賦稅逼迫下拋妻逐子、餓死道路的悲慘狀況，並請求朝廷不要向人民橫徵暴斂。所以韓愈提倡仁政的出發點，與絕大多數封建正統文人的主張一樣，首先保證封建君主剝削人民的根本權益，其次再考慮人民承受剝削的限度。《原道》《原性》中的思想，在後世被發展成維護中國封建秩序的基本原則，但在當時，是具有鞏固中央統治、反對分裂和苛政的進步意義的。

韓愈還寫了大量散文為那些才學兼備而仕途失意的文人鳴不平。他本人出身貧寒，又深知科舉考試的艱難，所以特別同情寒士而憎恨權貴。《舊唐書·韓愈傳》說他視權門豪士如同奴僕，見面瞪着眼睛毫不理睬。而家裡卻寄住着許多貧寒的士子。有時家人連早飯都吃不上，他卻怡然處之，毫不介意。正是出於如此鮮明的愛憎，他在文章中不遺餘力地抨擊朝廷執政者不識人才，不能任賢，批判官場中的醜惡和官僚制度的腐朽，諷刺各級官吏尸位素餐，指責上層社會士大夫中的種種不良風氣。《原毀》指出士大夫之間相互忌妒、毀謗的惡習

是推行聖人之道的主要障礙；《師說》批評士大夫不肯求師的不良風氣，提出無論地位高低、年輩長少，在道的面前應當人人平等，誰有道就尊誰為師；《送李願歸盤谷序》將權貴驕奢荒淫、作威作福的醜態和小人奔走權門、鑽營功名的尷尬相揭露得淋漓盡致。此外，《送孟東野序》《雜說》《諱辯》等也都是這類散文的名篇。

蘇軾稱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sup>④</sup>，這意思是說，從漢魏晉宋到齊梁陳隋八代，散文日益衰微，到韓愈手中才得以振興。這句話簡要地概括了韓愈對中國古代散文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韓愈對古文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提高了散文的文學價值。從駢文流行以後，散文就成了一種主要應用於說理記事的文體，與抒情言志幾乎無緣。韓愈的文章則往往在說理記事之中表現出自己倔強剛直的個性和憤世嫉俗的激情，所以不少應用文實際上是文學意味很濃的抒情文。尤其是他的「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也就是用近乎遊戲的筆墨大發牢騷的一類文章，更是純粹的文學性雜文。例如《送窮文》是一篇祭祀窮鬼的祝告文，寫主人

---

④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公打算把窮鬼送走，可是窮鬼偏賴着不走，反而挺委屈地訴說自己四十年來追隨主人的忠心，最後主人只好請它坐了上座。文章採用擬人化的手法，借祭鬼這種荒誕的形式，歷數作者半世「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的遭遇，道出了自己力圖擺脫窮困卻又無計可施的處境。戲謔式的自我嘲弄中又可見出作者堅守志節的傲骨。《進學解》是韓愈的名篇，和《送窮文》一樣，都是反話正說。作者本來的意思是感慨自己幾次遭貶，困守在國子博士的職位上，埋怨宰相目不識賢、大材小用。文章卻以國子先生讚揚聖君賢臣的一段頌詞開頭，稱道當今治世，野無遺賢，勸國子監太學生好好念書，必定有成。然後借一個學生之口，用國子先生自己徒有學問品行而不受重用的遭遇作為例證，反問先生精於學業又有何用。最後國子先生用一番自我貶責聊以解嘲。文章對執政者以頌為刺，對自己明貶暗褒，有無限冷語含在言外。

韓愈的散文還從先秦諸子和史傳文學取得借鑒，吸取小說的創作藝術，塑造生動的人物形象以反映生活的本質，這也是他使散文由應用性變為文學性的一大創造。他往往用傳奇的筆法，從人物事跡中提煉富有典型意義的細節。如著名的《張中丞傳後敘》一文塑造了張

巡、許遠、南霽雲等英雄人物的形象。其中寫到張巡讀書過目不忘，在數萬士兵居民中，見人問過一次姓名以後便能認識等細節，把他記憶力過人的長處和關懷士卒百姓的精神聯繫起來，便烘托出張巡敏悟博學、深得人心的特點。寫南霽雲向賀蘭進明求救兵而遭到拒絕時，通過他慷慨陳詞、拔刀斷指、抽箭射磚等一系列動作，將他忠憤填膺的神情和英勇義烈的氣概描繪得栩栩如生。普通人物在韓愈的筆下也都富有傳奇色彩。例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記述王適一生因門第低微、為人耿直而始終不能顯達的遭遇，前半篇只寫他三次求仕失敗的經歷；後半篇橫生一筆，追記王生向侯氏求婚的趣事。侯翁自視頗高，但一生不得志，所以發誓要將女兒嫁給做官的人。王適在媒婆幫助下拿了一卷冒充的進士文書前往，侯翁見有文書在袖便深信不疑，竟不再查看，把女兒嫁給了王生。一件令人解頤的生活趣事，生動地刻畫出翁婿二人敦厚至誠的性格特徵，以及胸懷奇氣而又落拓不遇的相同命運。

韓愈對散文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創造了富有創作個性而又豐富多變的藝術風格和表現形式。韓愈之前，散文主要用於政論和文論，結構一般是平鋪直敘、條分

縷析，變化既少，又看不出作家的風格特點。韓愈的散文以雄健渾厚、氣勢充沛、規模闊大為基本特色，正如前人所形容的那樣：「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sup>⑤</sup>，「沖飈激浪，瀚流不滯」<sup>⑥</sup>。同時又能根據不同內容變出多種風格。有的含蓄醇厚，如《送董邵南序》；有的警快奇突，如《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有的滔滔雄辯，詞鋒銳利，如《諱辯》；有的嬉笑怒罵，筆調冷雋，如《送李願歸盤谷序》。議論文中既有像《師說》《原毀》這樣邏輯清晰、富有卓見的專論，又有像《雜說》《獲麟解》那樣生動形象、全篇比喻的雜感。韓愈還經常將議論、敘事、抒情糅為一體，使各種藝術形式交互為用。如《柳子厚墓誌銘》是紀傳文，但傳中有論，史評結合，議論又成為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文章在敘述柳宗元願意代替劉禹錫到邊遠荒僻的播州去當刺史的事跡時，發了一大段議論，以柳宗元在待罪時仍為朋友着想的高尚行為，與世俗中人以利害相交的酒食朋友相比較，對世態炎涼痛加抨擊，同時指出柳宗元在政治上的不幸正促成了文學的

---

⑤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⑥ 皇甫湜《諭業》。

業績。這段議論蘊含着深沉的感慨和無限痛惜之情，對描寫柳宗元的形象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韓愈不但創造出「解」「雜說」等雜文的新體裁，而且改造了記、序、論、碑誌、祭文、書信等傳統的應用文體，使它們變出各種嶄新的形式。例如「廳壁記」本來是專門敘述官員設置和歷任職官變動經過的一種文體，李華和元結所作的廳壁記都很乾巴教條。而韓愈的《藍田縣丞廳壁記》就寫成了一篇幽默含蓄的小品文。祭文原是用來告祀神靈或祭悼親友的一種文體，因祭祀禮儀和行文格式所限，六朝以來的祭文多用駢文，很少見到感人的佳作。而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則字字血淚，純是一片摯情流成文章。文中回顧自己與十二郎從小相依為命的身世，抒寫由侄子早夭所引起的人生無常之悲，以及痛定思痛、疑信參半的心理，哀號悲吟，千迴百轉，可以稱得上是「祭文中千年絕調」。

韓愈繼承了先秦兩漢散文語言平易的優良傳統，同時又吸取辭賦駢文的表現藝術，根據當代口語的發展，對散文的語言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他一面努力揣摩前人的辭句，主張文從字順；一面力求務去陳言，詞必己出，從日常生活口語中提煉和創造出大量貼切新穎的比



喻和言簡意賅的語彙。如《送石處士序》一文中連用三個比喻：「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王良、造父都是古代善於駕馭馬車的人。古人認為用龜殼占卜可預知吉凶。這三個比喻稱讚石處士論事論人滔滔雄辯、駕輕就熟，而且有洞見之明，既生動形象，又一氣貫注。《藍田縣丞廳壁記》中說崔斯立「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巧妙地聯繫他修屋砍去木材枝丫，引水灌溉庭園的動作，暗喻他在縣丞職位上不得已磨去棱角，走前任縣丞的老路，破除了自己原來的生活準則。連類引喻，語帶雙關。韓愈散文中的許多比喻和辭彙，因生命力很強，已經成為今天廣泛使用的成語。如「俯首帖耳」「搖尾乞憐」「熟視無睹」「蠅營狗苟」「垂頭喪氣」「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同工異曲」「佞屈聱牙」「動輒得咎」「深居簡出」「俱收並蓄」「落井下石」「雜亂無章」等等。他還將駢四儷六的偶對改為單字奇句的排比對仗，字法句法靈活多變。如《原道》中「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三句，說要使佛教徒還俗變成人民，燒毀宗教的書籍，把寺觀廟宇改為民用的房屋。字法學習先秦古文，把名詞當動詞用，簡潔而有感情色

彩。《送孟東野序》中句法多達二十九種。《送李願歸盤谷序》中每段排比都不重複。對於駢文的句法，他也能適當地吸取，與散句錯雜使用，更增加了文章流暢奔放的氣勢。由於創造性地運用多種表達方法，使他的散文語言形成了簡練、鮮明、生動、準確的特點。除此以外，韓愈還改變了初盛唐散文冗長散漫的結構，壓縮為短小精悍的體制，每篇只說一事一意，大量運用對比以增強說服力，避免平板枯燥的鋪敘羅列，而章法大開大合，波瀾層疊，能在文筆的曲折變化中見出結構的縝密嚴謹。不過，韓愈有時為了炫耀自己的才華和博學，文章中也雜有生澀難讀的字句，這是他力求新奇所難免產生的毛病，對晚唐的古文產生過一些不好的影響。

韓愈文集的重要版本有《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即宋末王伯大的重編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遺文及《韓集點勘》四卷，明代徐時泰東雅堂複刻本，是舊時最通行的注本。另有馬其昶的《韓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版。

柳宗元生於公元 773 年，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

西永濟市)。二十一歲中進士，二十六歲中博學宏詞科，先後任集賢殿正字、監察御史里行等職。德宗貞元十九年（803），他與詩人劉禹錫等一起參加主張政治革新的王伾、王叔文集團。後升禮部員外郎。王叔文在唐順宗永貞年（805）間執政不到七個月，實行了一系列改革，如罷黜貪官污吏，免除苛捐雜稅，取締宦官強取百姓財物的宮市，將藩鎮控制的鹽鐵轉運大權收歸中央等等，但這些措施不久便遭到宦官和朝廷保守勢力的反對。王叔文被賜死，王伾病死在貶所，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被貶到邊遠州郡當司馬。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柳宗元在永州司馬任上十年，一腔積鬱只能寄託在山水和文章之間，寫作了幾十篇模仿離騷的詩文。元和十年（815），他被召回京師，又轉為柳州刺史。他在柳州時，設法幫助本地人民贖出被抵押為奴婢的子女。悉心指點了湘南許多前來求教的士人。四年後病逝，終年四十七歲。柳州人民非常懷念他，在羅池為他建廟。韓愈還撰寫了《羅池廟碑》，以紀念他在柳州的德政。

柳宗元年輕時才華橫溢，抱負遠大，嚮往着做一番救世濟民的大事業。政治上失意以後，便把精力用於著

書立說，現在留傳下來的四百多篇古文，大多是在貶官以後寫的。其中一部分政治哲學論文從典章制度、時令刑政、天人關係等方面，系統地闡述了他對「聖人之道」的理解，辨析先秦以來的各家政治學說，總結了國家興亡理亂的教訓。其中較著名的有《封建論》《六逆論》《斷刑論》《時令論》《天對》《天說》《貞符》《非國語》等等。《封建論》分析了周、秦、漢這幾個統一王朝失敗的原因，把郡縣制和分封制加以比較，指出分封制由父子世襲王位，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在用人方面不能保證「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所以不可取。文章還借歷史經驗說明藩鎮擁兵自重的危害，主張把藩鎮的兵權和郡縣官吏的任免權集中到中央。《天對》《天說》等文章認為天和自然界的一切東西都由「元氣」構成，根本不存在甚麼能夠賞功罰禍的天意。皇帝也不是受命於天，而是受命於人。國家氣運不取決於祥瑞，而是取決於仁政。這些進步思想奠定了他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柳宗元的論說文邏輯嚴密，文筆犀利，往往直接從要害處立論，從正反兩面提出質疑，結論也就水到渠成。例如史書記載說，周成王和小弟弟叔虞一起遊戲

時，把一片桐葉削成玉珪，給叔虞說：「把這個封你。」周公聽見後馬上來道賀，指出「天子不可戲」，促使成王兌現戲言，把小弟封在唐地。這事歷來傳為美談。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辨》就從小弟應當不應當封這個要害入手，指出如果當封，周公應該不等成王戲言就促成此事，如果不當封，就不應該入賀促成此事。由此對「天子無戲言」這一說法大膽提出否定，認為天子之言並非出口就是不可更改的法律，如果說得不對，就是改變十次也應該。短短一篇文章，連設幾層翻駁，連下幾層論斷，不費口舌就駁倒了一個傳統觀念。文勢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前人說「韓文如海，柳文如山」，正是指柳宗元的文章能以思路的峭拔引人入勝這一特色。

柳宗元還寫下了許多文學性散文，有的寄託政治失意的苦悶，有的諷刺醜惡的人情世態，有的反映勞動人民的疾苦，有的歌頌敢於伸張正義、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表現形式豐富多樣。如《愚溪對》《對賀者》《起廢答》等文章模仿先秦諸子散文的對話體，感歎自己被貶以後再不能起用的命運，嗚咽悲愴，不勝酸楚。《罵屍蟲文》《憎王孫文》《宥蝮蛇文》學習楚辭用惡禽臭物喻讒邪小人的比興手法，對上層社會的邪惡做了窮形

盡相的描繪，痛快淋漓地發泄了作者對它們的無比憎恨。除了借鑒前人的文體形式以外，柳宗元還在寓言、傳記和山水遊記這幾類散文中充分發揮了他的藝術獨創性。

先秦諸子喜歡在論辯中使用寓言作為論據，一般是一個故事說明一個道理，一篇中可以連用幾個寓言。柳宗元的寓言則是獨立成篇的小品文，每個故事中都包含着他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敏銳觀察，類比貼切，寓意深刻。如《蝮蠍傳》寫蝮蠍這種小蟲能背重東西，又喜好爬高，即使力不能任也不肯放棄。並用它為世上貪取財物祿位的人們勾出了一幅漫畫肖像。《三戒》中「臨江之麋」寫麋鹿仗着主人保護與群犬狎戲成習，最終為犬所食的故事，諷刺小人依靠勢力干求不屬自己同類的人物，同時也說明：與天敵暫時的友好相處不能改變敵人的本性，一旦失去警惕，必將遭喪身之禍。《黔之驢》除了諷刺那些不自量力、激怒強者的人以外，又為外強中乾、虛有其表的人物做了生動的寫照。《永某氏之鼠》寫永州某人因生肖屬鼠而愛鼠成患，用老鼠比喻乘時而肆行暴虐的人一旦失去時運，就會被殲滅，順便也挖苦了因迷信而縱容惡行的人。這些寓言都是柳宗元從政治

鬥爭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能夠揭示出生活中屬於本質的或帶有永恆意義的東西，像格言一樣警策。

柳宗元的紀傳體散文也很有特色。其中一部分看起來像是人物傳記，其實並不著意寫人，而是為了從中引申出某種道理，或是因有所寄託而作。如《種樹郭橐駝傳》為一個富有種樹經驗的園丁郭橐駝立傳，通過他所說的兩種養樹方法的對比，說明養物必須順其天性的道理，並與官府治人的方法加以類比，批評了不斷煩擾百姓的俗吏。《梓人傳》寫一個工匠頭擅長根據棟宇結構度量木材的本領，藉此指出宰相理政應當善於抓住綱紀而不是忙於瑣事。這類散文的重點雖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但仍注意心理的描寫和情節的點染，文筆生動而有趣味。如《捕蛇者說》通過捕蛇人蔣氏的訴說，揭示出苛重的賦稅對百姓的危害更勝過蛇毒。文中描寫捕蛇人在門外差吏催交賦稅的追呼聲中，「恂恂而起」「視蛇仍在」「弛然而臥」的一串動作，細緻地刻畫出捕蛇人這時將免交賦稅的安慰全都寄託在蛇身上的心理狀態，文字雖少卻描摹入神。

除了以上這類寓理寄慨的傳記體散文外，柳宗元也有一些着重塑造性格的人物傳。如《童區寄傳》記述兒

童區寄殺死兩名搶劫人口的「豪賊」的奇事，採用志怪小說的筆法，塑造了一個機智勇敢的少年英雄的形象。故事雖富於傳奇色彩，但因以越地落後野蠻的民俗和漢官縱容人口販賣的罪惡為背景，所以具有深刻的社會內容，人物也真實可信。《段太尉逸事狀》是柳宗元最著名的一篇記傳文。文章描述了中唐前期的一位正直官吏段秀實生平所做的三件事。第一件是鎮服連節度使都不敢干涉的郭晞及其部下的亂兵；第二件是賣掉自己的坐騎為農民代償租債；第三件是將藩鎮朱泚強行贈送的三百匹綾羅封在治事堂上。三件事寫出了段秀實剛直強項、堅持正義、敢於抗暴、關懷人民、清正廉潔的可貴品質。最後對他謙和柔弱的外貌補上一筆，便使人物形神兼備，躍然紙上。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主要寫於被貶永州的時期，藝術成就極高。他在山水中流連徘徊，探幽尋勝，主要是為了排遣心中的抑鬱。所以這些遊記不但觀察深細，描繪精確，而且寄託着遭貶被棄的悲憤。每篇的構思佈局也隨內容而異，變化百出。如《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運用明喻、暗喻和錯覺綜合描寫怪石的千姿百態，活靈活現，讀之似乎置身於一群正在互相搏鬥噬咬的飛禽走獸



之中。《遊黃溪記》的結構像是用線穿珠。溪上黃神祠、初潭、第二潭猶如三顆大珠，三處景物之間的距離猶如繫珠的線。文章逐段記步記里，寫法與黃溪在山中時流時積的水程正相應。黃神祠的絢麗壯觀，初潭的深幽寧靜，第二潭的陰森怪異，也都寫得各異其趣。《愚溪詩序》是借愚溪的名稱傾吐作者自己胸中的憤鬱。作者一邊給溪上丘、泉、溝、池、堂、溪、亭、島八處景色都用「愚」字起名，一邊又為這些佳勝都受自己連累而鳴不平。文章譏嘲愚溪不能灌溉、不能行舟、不能興風雨，句句是影射自己困在幽壤淺水、無所作為、不能濟世的命運。而在議論之中，愚溪水急石多、幽邃淺狹的風景也宛然可見。

《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遊記的代表作。八篇小記脈絡相通，按西南走向順序描寫西山及其附近的八處勝景，表現了永州山水蒼勁秀削的風貌。章法隨景而異，寄託深微曠遠。如《始得西山宴遊記》寫登臨山頂後仰見天穹的高遠寥廓，俯視群山的低矮渺小，通過誇張對比，以烘托西山雄奇挺拔的氣勢，抒寫作者傲然獨立、不與流俗為伍的精神。《鈇鋤潭西小丘記》由小丘被棄在邊荒的遭遇興起慨歎，暗寓作者懷才不遇、

淪落天涯的傷感。由於把小丘當作有生命有人情的對象來寫，人與景的相互溝通和理解也表現得新穎別緻、頗有情趣。《鈷鉬潭記》寫冉溪從南奔注，觸山石而曲折東流，沖盪涯岸，流沫泛成水輪，然後徐徐流去，只用六十多字便準確地寫出了潭水形成的過程和水速流勢的變化。簡潔精練，字字刻削，而又氣勢衝騰、跌宕有致。《小石潭記》寫潭水的空明清澈，準確地捕捉住潭魚靜止的瞬間以及游動時飄忽迅疾的動作，寫出了只有在日光照到潭底時才能見到的景象。《袁家渴記》寫一路所見到的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佳木異卉、美石岩洞，令人目不暇接，似乎漫無中心，最後卻拈出一個「風」字，用華美鋪陳的辭藻，將水聲、花氣、樹響一總收束到山間水上沖盪迴旋的大風中，染出奇光異彩，使繽紛繁雜的畫面歸結於「幽麗奇處」的主要特徵。這組遊記每篇只寫一丘一山或一澗一潭，但藝術表現各具特色，既有精妙傳神的景物描寫，又蘊含着人與自然共鳴的意趣，詞采清麗，情韻深長，達到了詩一般的境界。

柳宗元散文的基本特色是風格峻潔謹嚴、立意新奇深刻、文字精緻簡練。思維的精密和論鋒的銳利超過

韓愈，只是不如韓愈從容渾厚、規模闊大。他也有好用古字生詞的毛病，有些文章比韓愈的文章更難讀，但這一缺陷與他的成就相比，畢竟是次要的。明代文人茅坤說：「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斗仍自森嚴。」比喻韓文像大將坐鎮指揮，氣度從容，雄渾博大，開合變化使人無從推測；柳文如勁旅勇將突擊，既能出奇制勝，又自有森嚴的法度。可說是形象地道出了二人的異曲同工之妙。總的說來，韓柳雖因人生道路和創作個性不同，形成了他們不同的藝術風格，但他們都以富有開創性的精神革新了傳統的散文，為唐代散文的振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柳宗元文集的重要版本有《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一卷，宋人童宗說注釋，張敦頤音辨，潘緯音義，《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柳河東全集》四十五卷，外集五卷，附遺文及附錄，明人蔣之翹輯注，《四部備要》據蔣氏三徑藏書本校印。新中國成立後有《柳河東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58 年排印本。吳文治等校點的《柳宗元集》，中華書局 1979 年版。

## 宋啟文運 功歸歐陽

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促使中唐以後散文的作者和數量大大增多。但韓門弟子的成就卻遠不及韓柳。他們片面發展了韓柳散文中用奇詞難字的傾向，使古文逐漸衰落。這時駢文又興盛起來。晚唐出現了李商隱、溫庭筠等駢文大作家，文風由盛唐以來的宏博典雅轉為華麗濃豔。這種風氣到五代和宋初仍然流行文壇。宋初一度出現過復古的思潮，柳開、王禹偁等曾大力倡導古文。但他們死後，文壇宗主楊億、劉筠便拋棄古文，改寫時文。所謂「時文」，是指楊、劉用詞采華麗、堆砌典故、講究聲律對偶的晚唐體所寫的駢文。楊億、劉筠都是宋真宗的御用文人，他們在奉詔編寫《冊府元龜》的閒暇，互相唱和，寫了一些點綴昇平的詩歌。這些詩主要是模仿李商隱，從前人著作中摘取一些現成的句子和典故，重新組織而成。楊億把以他為首的十八個文人所唱和的詩編成集子，題名為《西崑酬唱集》。所以他們用這種方法寫作的詩和駢文都被籠統地稱為「西崑體」。由於楊、劉二人文學修養很高，又擔任草書皇帝詔令的職務，劉筠又幾次主持科舉考試，所以科場

上的文章也以時文為主。這種文風在社會上大約流行了四十年之久。

宋仁宗時，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得到不少文人的支持，革新派把文風的變革看作政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起來反對楊劉時文的主要有兩大文人群體。以石介、孫復為代表的一群文人主要活動在山東泰山，他們主張全面復古，學習韓愈。石介最為激烈，是攻擊「西崑體」的急先鋒。另一群文人以蘇舜欽、尹洙、歐陽修等為代表，主要活動在河南洛陽。穆修最早將家裡的唐本韓柳集鏤版印刷幾百部，帶到京城大相國寺出售，並與蘇舜欽兄弟一起寫作古歌詩雜文。後來尹洙兄弟又向他學習古文。歐陽修早年就對韓愈文章十分仰慕，在洛陽做官時結識尹洙，便一起寫作古文。范仲淹在仁宗慶曆四年（1044）施行新政，設立太學，學生必須精通經術。石介、孫復都到太學裡去當學官。所以古文便逐漸取代了楊劉時文。但這時太學裡又出現了一種「險怪僻澀」的古文，稱為「太學體」。這種文章內容大多是稱頌唐堯虞舜之道的高談闊論，文字奇僻生澀。因不少太學生憑這種文章在科舉考試時博取了高等，所以流行了十三四年之久。到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擔任貢舉的

主考官，凡是文章怪僻的考生一律不予錄取，「太學體」才遭到有力的打擊。歐陽修還在這次考試中把蘇軾的古文拔到第二名。蘇轍和曾鞏一起被錄取為進士。在反對迂闊險怪的文風的同時，歐陽修大力推薦王安石、曾鞏、三蘇那些博古通今的「有用之言」，要求學者研究古道必須適用於當前時務。他自己的創作也以平易簡潔的文風為一代文人做出了表率。經過歐陽修的不懈努力，北宋古文終於扭轉了脫離社會現實的不良傾向，確立了平淡典要的文風，避免了重蹈中晚唐古文自行衰落的覆轍。前人把歐陽修稱為宋代的韓愈，正是因為他振起一代文運的功勞，不在韓愈之下。

歐陽修生於公元 1007 年，字永叔，廬陵（江西吉安）人。四歲喪父，家境貧窮。由母親教養成人。二十四歲以第一名中進士，在西京（洛陽）留守錢惟演幕府中任推官。他在政治上堅決支持范仲淹的改革，為人正直，有度量，而且見義勇為。范仲淹被貶時，諫官高若訥不說話。歐陽修便寫了一封信譴責他，這就是著名的《與高司諫書》，為此得罪被貶為夷陵令。慶曆年間，他與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同時被起用，任諫官。當時反對范仲淹的人誣衊他們這幾個人結成朋黨，歐陽

修又著《朋黨論》獻給皇帝。慶曆新政失敗後，范仲淹被罷相。歐陽修被降職，後貶滁州，自號「醉翁」。由於他在政治上和文學上都有很高的才能，往往貶官後復又起用，曾擔任過朝廷和地方上的許多官職。嘉祐六年（1061），升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神宗即位後，起用王安石變法，他趨向保守，告老退居穎州。公元1072年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謚「文忠」。

歐陽修是北宋文壇的巨匠，一生著作極其豐富，曾主修《新唐書》《五代史》等史書。還著有《易童子問》《詩本義》《居士集》等文集。他的散文數量很多，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政論、史論和文論；一類是寫景、抒情、記人的散文。他的政論對北宋政治中的重大弊病如土地兼併、官吏冗濫、上層社會奢侈、徭役賦稅繁重等，都做過具體的分析，並對財務、邊防、任賢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切實的建議。他的文論大多發表在與友人和士子的通信中。與韓愈一樣，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他把「道」比作金玉，「文」比作金玉的光輝，認為只要作家修養深厚、文章內容充實，文章就自然有光彩。同時他又認為道德修養好的人，不一定是文章家，所以還要重視文章的表現形式和藝術技巧。他自己的文

章因為內容切實，論事必究根本，所以見解往往高人一頭。就以《朋黨論》這一名篇來說，一般人論朋黨，總是說君子無黨，因為皇帝最忌諱朋黨。歐陽修卻說君子有朋、小人無朋。只從「朋」的真偽上立論，闡明治亂興亡的關鍵不在有無朋黨，而在於能否用君子的真朋，退小人的偽朋，這就點透了問題的實質。不過，這類文章意思雖然透闢，卻寫得從容舒緩，不動聲色。即使是罵人最兇的《與高司諫書》，也是款款道來。先說自己從聽到高司諫的名字以來，十三四年間，曾三次懷疑對方是否君子，最終還是得出了高司諫不是君子的結論。然後又說明得出這一結論的理由，舉出高司諫隨眾人排詆范仲淹的事實。再退一步說明無論范仲淹是不是賢人，高若訥作為諫官，都不應當等他失敗才隨後非議。把道理從正反兩面說透以後，又用尹洙等人挺身而出要求與范仲淹同貶的精神作為反襯，最後才毫不留情地指責高司諫「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詞鋒雖然犀利，但論證委婉曲折，滴水不漏。又如他的另一名篇《五代史伶官傳序》評論後唐王朝興衰的原因，先以莊宗當初得天下時的神氣與後來困於伶人的狼狽情景做對照，在敘事中做一層揚抑，又用議論再做一層揚抑，總結出「憂勞可以



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低昂頓挫，在短章中見大開大合之勢，筆調卻從容不迫，因而被後人譽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歐陽修的記敘文大多委婉流暢，搖曳多姿，能以情動人。《瀧岡阡表》是他所作墓表中的名篇。文中回憶父母在世時對自己的期待，所記的只是平常生活中的淺語，卻能令人從人物的人品氣質想見其音容笑貌。歐陽修的母親了解兒子剛正不苟的性情，始終節儉度日，有應付患難的思想準備。在歐陽修被貶夷陵時仍能談笑自如，安之若素。這種對窮達貴賤毫不介意的高尚品格，全在平淡的敘述中見出，但親切樸實，相當動人。他還有不少為紀念友人所寫的詩文集序和祭文，多採用夾敘夾議的方式。既有對友人一生文行的精彩評論，又有感人至深的追輓哀思。如《梅聖俞詩集序》對梅堯臣一生不得志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時給予其詩歌創作以極高的評價。並由此推斷出一個著名的道理：凡是傳世的佳作，往往出於窮困失意者之手。因為這些人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便將內心的積鬱寄託於風雲山水，草木蟲鳥。他們的憂思感憤變成怨刺之言，往往能反映百姓的愁苦。所以人愈窮，詩就愈好。這段富有獨創見解

的評論，不僅適用於梅堯臣，也對作家生活與創作之間的關係做了規律性的總結，所以被前人稱為「千古不易之論」。文章最後惋惜梅堯臣不能進用於朝廷，喟歎之中透出無限感慨。《蘇氏文集序》則一面痛悼蘇舜欽遭仇人排擠抑鬱而死的結局，一面極力推崇他創作古歌詩雜文以力矯浮華文風的功績。既精確地概括了蘇舜欽一生的命運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又讚美了他不肯隨俗俯仰的品格。文章還由文風的難變談到人才的難得，為蘇舜欽的不幸再三歎息。文章似敘事，似議論，又似抒情，而在悲涼的追憶中，蘇舜欽文章人品的光華也得到了充分的顯露。

歐陽修為人心胸開闊，遊記也自有一種開朗高遠的境界。《醉翁亭記》把作者因新政失敗而鬱結在心裡的苦悶，消化在與民同樂的場面中，所以寫得十分快活熱鬧，毫無柳宗元那種幽冷孤清的情調。章法也很有特色：像打圍一樣，從滁州四面環山的全景落筆，然後逐漸將視野一圈圈縮小，將人從群山帶到琅琊山，再從琅琊山帶到釀泉，最後在觥籌交錯的宴會上，把焦點凝聚在太守身上，突出了一個不拘形跡的可愛的醉翁形象。全文連用二十一個「也」字，又以兩段對稱的排句，概